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瑞士国家形象宣传的『三驾马车』

□ 丑则静

瑞士领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但这丝毫不妨碍它在国家形象宣传领域做出“大文章”。瑞士给世人太多关于高效管理、先进科技与美好风光的想象，在2016年被联合国评为“全球十大最幸福的国家”。可以说，特有的国家形象宣传机构、旅游产业与人文名片作为国家形象宣传的“三驾马车”，助力瑞士持续保持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各国民众心中的正面形象。

机构统筹：推开瑞士一扇窗

国家对国家形象的关注，就如同个人对自身形象的关注。1976年，隶属瑞士联邦外交部的“对外介绍瑞士协调委员会”成立。在此后4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对外介绍瑞士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瑞士海外形象合作委员会、瑞士形象委员会等机构，并最终确立联邦外交部下属的瑞士形象委员会统筹协调，各海外代表、维护瑞士形象办公室积极配合开展宣传、交流活动的国家形象宣传格局。

瑞士形象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1月1日，在瑞士的国家形象宣传格局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时任瑞士形象委员会主席马蒂亚西曾评价道，“瑞士形象委员会成立最大的收获是建立起一个统一、综合的协调机制，将政府部门与各行业机构组织在一起，形成外宣合力，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联系网络”。

首先，定位明确。瑞士形象委员会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外交部，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现实运作中吸收非官方力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例如，负责瑞士形象委员会决策制定的管理委员会，在其全部15名委员中只有主席来自瑞士联邦外交部，其余多来自瑞士经济委员会、文化基金会、外国人协会等民间机构，突显形象委员会人员构成“非官方”色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瑞士对外宣传决策普遍具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其次，目标清晰。瑞士形象委员会在对外宣传方面一刻也不曾放松，制定了差别化、精准化的策略。为在对外宣传中突出重点国家与目标群体，形象委员会针对不同国家，提出了对外形象宣传的“新三环”思路，即以瑞士周边历史、文化相近的国家为第一环；以英美等西方世界大国为第二环；以中国、日本、印度等瑞士在欧洲以外地区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为第三环，集中针对年轻人与知识分子开展宣传工作。

第三，手段多元。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与新媒体传播的兴起，瑞士形象委员会也在具体宣传实践中不断创新形式，在具体项目运行过程中灵活切换，形成“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模式。例如，瑞士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契机对瑞士国家形象进行宣传，在世博会召开之前，瑞士形象委员会邀请中国媒体代表团赴瑞士进行考察，对瑞士进行全景展示。而在世博会举行过程中，又通过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等多种平台发布关于瑞士世博会展厅的宣传视频，使瑞士意图传播“城市与乡村互动”的理念得到广泛关注。

旅游带动：打开瑞士一扇门

瑞士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旅游业的摇篮”，美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吸引各国游客进入瑞士国门，并在口碑相传中优化了瑞士的国家形象。

在自然旅游资源上，瑞士位于欧洲屋脊，阿尔卑斯山区占其全国领土面积的60%，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特征赋予瑞士雪山、冰川、湖泊、河流、温泉、奇峰等六大绝美自然景观。“欧洲风光在瑞士”，得名不虚。同样的，在人文旅游资源上，由于瑞士长期奉行中立政策，国家虽身处欧洲中心腹地，却在几个世纪以来远离欧陆群雄纷争所点燃的绵延战火；更由于瑞士国内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与严格的文物保护政策，日内瓦、苏黎世等历史名城几世纪不改其风貌。而所有的这些旅游资源都作为宣传瑞士国家形象的素材，随着瑞士旅游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展示给世界。

分析瑞士旅游业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政策引导成就了瑞士旅游业几个世纪以来的长盛不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士便成立联邦旅游联合会，从政策、法规层面规范、促进瑞士旅游业的发展。而在此后成立的瑞士国家旅游局、各州旅游分局则主要通过吸引游客到访与举办专题旅游推广活动，积极对瑞士以及瑞士旅游业进行宣传。一方面，在吸引游客到访上，瑞士国家旅游局积极创新宣传手法、丰富宣传内容，并努力提升旅游业相关服务人员的从业水平，不断更新接待方案、增强接待能力。另一方面，在举办旅游推广活动上，瑞士国家旅游局每隔1—2年便会提出不同的旅游主题与口号、在度假胜地举办“瑞士旅游市场”活动、邀请国际新闻媒体赴瑞士进行考察，这些举措都发挥着较好的宣传效果。

文化名片：塑造持续吸引力

现代意义上的瑞士联邦起源于1848年，100多年来瑞士人形成了勤奋、节俭、好善等美好品质，而这也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形象名片，供政府发掘与宣传，供世人感知与体会。

名片一：勤奋。“我们没有资源，有的只是一双手”，这是瑞士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瑞士国境几乎都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虽然拥有多样壮美的自然景观，但也必须直面可耕地少、矿产资源匮乏、冬季寒冷漫长等不利条件。在这里，公职人员平均的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而每年的带薪休假时间却是全欧洲最少，对此瑞士人鲜有抱怨。即使到了节假日，瑞士人也多喜欢在自家花园里“劳动”，种植花草成为每个瑞士家庭喜欢的休闲活动，各家各户的“盆景作品”也在时时处处装点着这个美丽的国家。

名片二：节俭。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12735美元以上的国家即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瑞士以人均GDP81324美元，位列世界人均GDP排行榜的第4位。但在这样一个富裕之邦，瑞士人却以吃苦耐劳闻名，善于理财，并以低碳生活为美。在日常生活中，瑞士人很少购买奢侈品，并遵守着一种近乎严苛的垃圾分类处理法，他们不厌其烦地按照玻璃瓶、塑料品、罐、旧报纸、无用废物等五大类将垃圾封装，并统一回收处理。

名片三：好善。在瑞士生活过的人都会普遍感到，瑞士人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车停得不规范有人管，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有人管，就连你在自家门前堆放过多杂物都会有人敲门要求清理。不过也正是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从侧面反映出瑞士人良好的公民道德与法律意识，也成就了瑞士人的好善。世界上最著名的对不相干人甚至敌人施以爱心的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就是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发起创立，便是最好的例证。

战略视角

德国老工业基地如何实现转型

□ 魏中海　张宪昌

作为德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鲁尔区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探索转型之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鲁尔区从一个高炉林立的煤钢工业基地，蜕变成一个集电子信息、新式能源、生物医疗、文化教育、休闲创意和旅游服务等于一体的欧洲大都会。当前，鲁尔区的转型仍在进行中。纵观德国鲁尔区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史，管根本、管长远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产业转型增动力

1968年，在北威州政府制定的《鲁尔发展纲要》推动下，煤钢传统产业内部进行技术改造和“关停并转”，为鲁尔区产业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鲁尔区第一次产业转型，依托煤钢资源优势，延长拉伸产业链条，形成了化学化工、机械制造等主要新兴工业部门。同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在1979年《鲁尔行动计划》带动下，实施一定的投资补贴政策，引进了一批电子信息、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企业。第二次转型始于1989年。北威州政府启动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计划，注重生态环境修复和历史文化保护。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鲁尔区形成了以服务和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门类。目前，在鲁尔区220万的就业大军中，从事服务部门的人员比例高达70%。在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四大专业领域中，医疗管理、物流业就业人数大约分别为23万、16万，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领域约为8万人，化学领域仅为2.5万人。

基建完善筑活力

在产业转型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拓展扩建交通运输，建立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早在1968—1973年的鲁尔区交通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对以前的交通线路进行技术改造。通过加强水路联运，修建新的高架铁路和高速公路，引进新型列车，建立区内快车线，增强区内边远地区与中心城市之间以及它们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鲁尔区建成了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拥有1万多公里的铁路线，600公里的高速公路，3300公里的乡村公路，270公里的水运内航道和繁忙的航空运输线，大大方便了人们出行、投资设厂和商贸往来。二是不断更新能源设施，光伏发电、绿色建筑逐步成为主流。1998年10月，德国政府提出了10万屋顶计划，对屋顶太阳能发电给予较高的补贴，推动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在鲁尔区的规模化应用。三是建立起便利快捷、高效运行的现代通讯和物流设施。受益于德国实施的《21世纪德国信息社会》（1999）、《德国高技术战略》（2006、2010）、《工业4.0战略》（2013）以及《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2016）等国家政策，鲁尔区建立了世界一流的互联网、物联网基础设施，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科教文化长智力

区域转型，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的转型，实现知识、技能和文化的转型。从1962年第一所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建立开始，鲁尔区陆续建设了20多所应用科学类大学，设置了500个专业课程，鲁尔区成为了世界上最密集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充足的经费是鲁尔区教育繁荣的保障。《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提出，2015年社会总支出中教育和研究的比例增加至GDP的10%，这一目标在鲁尔地区基本实现。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3%，其中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投入1/3，带动经济界投入2/3。为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鲁尔区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从多特蒙德经过波鸿、安森、哈根直到杜伊斯堡建立起一条贯穿鲁尔全区的技术转化之路。成立专门的“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和专业的新技术服务公司，为新技术应用提供资金、咨询服务。在文化上，尊重历史、敬重历史，将工业遗址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形成了3500多所工业遗址、200座博物馆、120个剧场、100多个文化中心和音乐厅。2010年，艾森被指定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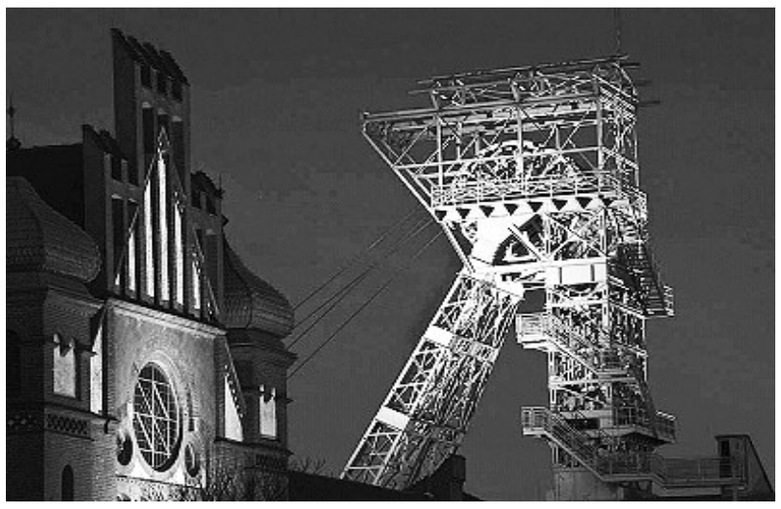
生态修复聚潜力

生态转型是区域转型的必然选择，是吸引人才的天然磁石。针对1962年鲁尔工业区雾霾事件，1964年北威州颁布了《雾霾法令》。在联邦政府层面，颁布《联邦污染防治法》（1974），缔结《关于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1979），签署《哥德堡协议》（1999）。从2005年1月1日起，德国实行统一的欧盟排放标准。如今，环境气候保护成为鲁尔区转型之路的一大亮点。鲁尔城市群2022年的发展目标，变成了以气候、变化、城市为主题。针对河道污染，建立完整的供水系统和污染净化系统。针对报废的矿井，进行修整。针对污染严重的土地，由州政府出面设立土地基金，购买、修复、转让给投资者。在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的同时，实施营造绿色空间计划。1989年实施的为期十年的《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计划》，涉及植被保护和绿色景观打造、埃姆舍河污水收集网生态改造、花园式工厂转型、工业遗存建筑保留与改造等六大主题。这一计划投资总额高达40亿马克，除了本地政府提供了公共投资外，还接受了欧盟的公共性资金，吸引了1/3的私人投资。

社会保障汇合力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缓冲器，也是区域转型的减压阀。完善的社会保障，在区域稳定有序转型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不仅能够承接转型带来的摩擦与震荡，还能够转化为积极推动转型发展的合力。社会保险是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领域，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五大类别。健全的保险制度，保证了鲁尔区煤矿工人及其后代良好的生活和充分的教育。面对转型带来的失业，联邦政府支付法定的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职业培训补助金等，从经济上尽可能的把失业的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并最大限度地促进再就业。为了增加新就业岗位，州政府吸引企业向鲁尔区煤矿集中的北区投资建厂，曾提供相当于其投资总额10%的就业赠款。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推行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尽可能吸纳就业人员。直到今天，多特蒙德市的手工制造依然比较兴旺，吸纳了不少劳动力。2016年4—7月，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失业率已下降至8%以下，尽管仍然高于德国的平均水平，但相对于过去的两位数字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山之石



鲁尔区的卓伦煤矿被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工业博物馆

美国枪击案背后的社会问题

□ 游志斌　刘媛媛

10月14日，芝加哥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40人受伤。据统计，2015年美国共发生52625起枪支暴力案件，13346人死于枪击。类似事件如果简单归咎于枪支泛滥，可能并未真正反映出枪击案背后的深层问题。加拿大人口3500多万，大约6%的人拥有持枪执照，但与美国相比，治安状况显然要好很多，尤其是恶性枪击案件较少。美国枪击案多发、频发、易发，暴露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难以忽略的“种族犯罪歧视”

种族犯罪歧视的显著特征是执法人员过于强调犯罪嫌疑人的“种族特征”，从而先入为主地为嫌疑人贴上“犯罪标签”，这非常容易造成执法过程中的“有罪推定”，增加了开枪的几率。从美国人口结构来看，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3.2%（截至2013年），但占到了全美被逮捕人数的28.3%。具体来看，2013年全美因涉嫌恶性暴力犯罪（谋杀、强奸、抢劫等）而被逮捕的39万人中，黑人高达38.7%。另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一个高中辍学的美国黑人，他在35岁时入狱的概率高达70%，是同等情况下白人的4.6倍多。这些数字虽然不能简单说明美国警察更喜欢抓捕黑人，或者警察执法存在着“种族主义”，但是从执法人员的心理角度来看，很难避免在执法过程中的“种族犯罪歧视”，从而有可能影响个体的执法行为。

以暴制暴的社会文化及背后的利益集团

以暴易暴的社会文化，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一般来讲，每次惨烈的枪击案发生之后，都会引发对“持枪”与“控枪”的激烈讨论，甚至是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或骚乱，今年9月1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由警察枪杀一名黑人男子引发骚乱，持续的骚乱促使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帕特·麦克罗里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枪击案发生后，也会引发枪支销售增长等一系列效应。因为，美国民众既担心“控枪”的规定变为现实，以后再无法购买，又担心自我安全受到威胁，“持枪”自我防卫的意识会大大增强。枪支带来的“以暴制暴”的威慑作用在美国民众认知中很难消弭。“以暴制暴”并非良策，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无论是美国各级政府，还是司法当局，却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来打击犯罪。其实，从上世纪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便强调“向犯罪开战”。此后，由于对入狱犯人的改造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预算的投入不足，导致到目前为止，在“向犯罪开战”数十年后，美国社会的恶性枪击案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愈发凸出。

恶性枪击案频发，美国控枪为什么仍然这么难？除了文化因素外，利益集团的因素不容忽视。在2015年12月2日，加州南部圣贝纳迪诺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4人遇害、17人受伤，2名嫌犯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击毙，酿成全美3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也引发了奥巴马政府关于持枪的激烈辩论，这已不是奥巴马第一次尝试在控枪上有所作为。奥巴马曾于2013年1月16日在白宫公布了全面控枪对策。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成为阻碍控枪的关键因素。美国步枪协会拥有140多年历史，在2013年时，该协会拥有500万会员，是美国最大的枪械拥有者组织，对美国总统大选，甚至国会、州、县议会选举都有巨大影响力。美国历史上有8位总统为该协会成员，该协会长期支持共和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就声称“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解除奥巴马的控枪令，以保护拥枪自由”。统计显示，在2014年总统选举周期内，美国步枪协会共捐献98万美元，游说费用为336万美元。除了美国步枪协会外，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枪支管制的协会或组织，比如第二修正案基金会、公民有权持枪协会、美国枪支持有者、犹太人维护枪支权利协会以及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等等。整体来看，赞成控枪的组织和力量仍然较弱。

“首要保护执法权”的制度设计

“首要保护执法权”的制度设计是指在公职人员进行执法活动时，首要保护执法人员的权利。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枪支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在上世纪70年代，每10万名警察在实战中约有60人殉职。后来美国政府不断重视对执法人员的权利优先保护，在美国任何一名警察殉职或造成无辜人员伤亡，都必须要有人负责。如果是指挥、装备、训练等方面问题，都会考虑警务领导者的责任；但如果警务人员本人处置失当，那么就是警务人员自身的责任。在美国执法训练环节，不单是为练一个开枪的技术动作而练动作，而是要把执法中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追求训练效果的实用性，从而提高警察的执法能力。在美国警务人员开枪事件后，美国警方还会考虑参与人员的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剧烈反应，通常会建议涉枪警察休息至少3天时间，让其做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首要保护执法权”的制度设计还体现在司法程序的设计中，2012年3月，佛罗里达州社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枪杀17岁黑人崔文·马丁，也曾引发抗议。乔治·齐默尔曼由正当防卫转而被控二级谋杀，但一年后陪审团最终裁决乔治无罪。美国司法部于2015年2月结束调查，结果依然是不起诉乔治。调查认为乔治被崔文推倒在地并被殴打，乔治感受到了威胁才开枪自卫，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乔治枪杀崔文是出于种族主义。此外，美国陪审团的制度设计，法官对于警务人员在执法中的风险都会纳入裁量，这些因素都使警务人员的开枪有时“有恃无恐”。

域外镜鉴